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Education
【東亞教育史探索】

東亞教育史研究的新動向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Education

高明士*

關鍵詞：師範、內外、中西、廟學、書院、文化圈

Keywords: teacher-tra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ina and the West, Confucian temple school, academies, culture sphere

* 玄奘大學通識中心講座教授。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03年11月17日，由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之「東亞教育史研究的近況與方法」研討會。

摘要

教育史學，是在西方近代史學影響下，受到日本近代教育史學影響最深的學問。本文所謂東亞研究，是指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區的研究；越南雖然理應包含在內，但由於筆者目前所見皆無所得，因而從略。本文所謂教育，係取狹而廣之義，即以學校教育為主，兼及於私學。取材以專書著作為主，撰述的涵蓋時間，則從十九世紀末至2000年左右。

教育史著作，在十九世紀末主要係為了配合新建立之師範教育而作，其內容多採中西兼述之方式，間而有國別教育史之作。到廿世紀初以後，則反以國別教育史之著述為其常態，其中尤其以1930年代之成果最為輝煌，這種現象，在其他史學專門領域中亦然。一般說來，在二戰前的教育史著作，係以學校教育為主要內容；戰後，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教育史內容呈現活潑化，除持續以學校史為中心的研究以外，研究的焦點亦逐漸擴展為多元，例如教育文化史、庶民教育史、生活教育史、家庭教育史、婦女教育史、地方教育史等諸多分野的開拓。本文雖是以通史論述為主，略於諸專門史，但仍可窺知其內容在教育通史中的比重有增加之勢。由此可推，今後對於書本以外的教育活動探討，勢必繼續加強。其次，著述內容除中西兼顧或側重於國別史外，戰後亦開拓以東亞，甚至以亞洲作為歷史研究的範疇；尤其包含孔廟在內的學校建構，也就是所謂「廟學」之教育制度。本文以為在傳統東亞地區普遍存在的廟學研究，實是戰後以來有關教育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Education History in East Asia appear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but was most influenced by the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Japan. "East Asian" in this paper includes China, Japan and Korea. Vietnam is not included due to the lack of sources. "Education" here takes on the meaning of schoo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private school.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monographs and books on this topic, from roughl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year 2,000.

Books on Education Histor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mainly by-products of the institution of newly established teacher-training systems. At the beginning, they usually covered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Occasionally we see some books on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cholars more commonly wrote education history of individual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1930's. The same tendency is also seen in the other areas of historical writing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writings of education history were focused on school education. After the WWI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the content of books on education history became more lively. In addition to the them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focus became more pluralistic and was broadened to include histories of educational culture, grass-root education, life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women and local education etc.

This essay mainly deals with the writings of general education history and does not touch other aforementioned specific fields, but does show the increase of these specific fields. In the future, more research is required on the activities beyond books. Furthermore, the content of writings should be enlarged to include the study of educatio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 even of Asia as a category. The search and discovery of the universal existence of the "Confucian Temple School" system in East Asia is also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the post-War education historiography.

一、前言：新教育史學的成立

近代史學是在西洋史學的影響下成立，有一般史（或謂普遍史、通史等）、專門史等的分野，教育史學乃是專門史之一。我國之有教育史學，也是在西方史學影響下出現，但受到日本近代教育史學影響最深。現代觀念的「教育」，學界有廣狹兩種說法，廣義者，凡增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品德的活動，都是教育；狹義者，指學校教育。簡言之，教育本身是一種文化活動。一般通史之論述，都以學校教育為主，兼及私學，可說取狹而廣之義，以下所闡述者，大致是以此為範圍。

由於撰述時間倉促，此處所陳述的東亞教育史，只能就通論之專書部分作說明，至於各斷代以及論文之整理，則有待來日。資料取材之時間，原則上從十九世紀末至 2000 年前後，但以二戰後發展作為轉折重點，來探討其研究趨勢。所謂東亞，指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區的研究，越南理應包含在內，但以目前所見皆無所得，只好從略。

二、中國教育史

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方面，最近因有大陸出版之杜成憲、崔運武、王倫信等著《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全書九章中，用五個章節（第五章至第九章）對中國大陸在 1949 年以後的研究成果，作了詳細說明，此一部分擬予省略，欲知其詳，讀者可參閱該書。此處只著重於 1949 年前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以及戰後臺灣學界的研究成果。

傳統中國的教育活動，也是屬於狹而廣的教育定義，蓋教育活動可包括以下三大類，此即：官學、帝王學、私學，官學是教育政策實施之地，理論上是該時代教育活動的代表，但實際上則以私學教育為盛。在此前提下，本文所談的教育，不含考試或科舉制度，雖然大部分學生離開學校後，仍然參加科舉考試，但就制度而言，教育與考試是有別的。

論「教育」兩字的起源，最早見於《孟子·盡心上》所說的：「君子有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但作為學科分野之一的「教

育史」，也就是探討教育活動的歷史，屬於文化史的範疇，恐要晚到清末民初以後了，這是因為仿效日本而建立的學門領域之故。

就出版時間而言，在中國出版最早一部教育史，當數日人狩野良知的《支那教學史略》上、下兩卷。顧名思義，該書內容為中國教育史，而且用中文書寫，起初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在日本東京刊行（發行兼印刷者為吉川半七）。光緒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刊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所藏，即是明治二十四年之初版本。但在此時的日本國內，已有數部《日本教育史》著作出版（含翻譯本），最具代表者為佐藤誠實《日本教育史》上（1890）、下（1891）。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使中國近代新教育進入實施階段。在此學制所規定的大學堂、師範學堂等學校的課程中，都規定「教育史」科目。其內容，多採用中外歷史兼述。最初的著作或者教材，大多是翻譯日本著作，或者翻譯英美著作，或者參照諸外國著作而編譯者，真正屬於國人著作者則較晚出版。例如：蔡良寅、賀廷謨譯述，中野禮四郎著《東西洋教育史》（上海：開明書店，1903年），孫家樹譯，增戶鶴吉講《教育史》（江蘇學務處，1906年，江蘇師範講義），以及韋以黼《教育史》（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07年）等。另外，清末葉惟善撰有《教育史講義》、《續教育史講稿》，其手稿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稿本完成時間不明，惟由內容視之，其第二編第六節敘述日本現時代教育時，以敘明治四十年（1907）為最近，因而推斷其講稿當完成於1907年或翌年左右。葉氏《教育史講義》，署為兩淮師範學堂，分為〈總論〉（第一節為「教育史之性質」、第二節為「教育史變遷之事實」、第三節「教育史研究之順序」），第一編〈中國教育史〉，第二編〈日本教育史〉，第三編〈東方諸古國教育史〉（含印度、波斯、埃及、猶太、阿剌伯等），第四編〈泰西教育史〉（含希臘、斯巴達、畢達哥拉士、雅典，以下似有脫文，下接第十三節教具、第十四節特殊教授、第十五節教授上之資格、第十一章訓練編、文末附中西名詞譯文對照）。其《續教育史講稿》，首敘近代教育家略傳，下接第五章〈泰西最近之教育〉，敘述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美、俄、意各國。在〈總論〉中，第一節為「教育史之性質」，首曰：「就往古之教育事實，研究其盛衰得失之故，

以資今日之考鏡者，其惟教育史乎？」在國難當前的清末時期，可謂語重心長；就今傳不完整之稿本視之，其內容包含中西，更難得的是包括東方諸古國教育史，這是一般教育史不易做到的。

由國人所寫第一本《中國教育史》著作，究竟何者，甚難論定。可能是由黃紹箕提出提綱，而由柳詒徵於清末宣統二年（1910）撰成的為最早，約於 1925 至 1927 年出版。但若論出版年次，當以郭秉文的《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在 1916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最早。黃炎培的〈序〉，說此書是「空前之作」。只是本書原為英文，而由周槃譯述。1921 年，王鳳喈任教育史講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校設長沙城南書院舊址，此為宋代張栻（號南軒）講學之地。1925 年，王氏編成《中國教育史大綱》，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為中文版第一本通史的《中國教育史》著作。但如書名所示，屬於「大綱」性質，著重教育演變之前因後果分析。其後，王氏重新編寫，將書名改為《中國教育史》，在 1943 年，由教育部審定為大學用書，交由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印行。1945 年，在上海發行滬初版。1951 年，在臺北發行臺一版，成為大學教育系講授中國教育史的重要用書。

此外，1926 年，陳青之撰成《中國教育史》上卷，由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室出版；1934 年，完成中、下卷；1936 年，三卷合併出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這是較早使用《中國教育史》作為書名而出版的著作。其次，恐是徐式珪《中國教育史略》，起初於《學藝》9：7/8、10：3、5、7、9（1927.6 - 1930.11）連載，其後於 1931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又，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上海：商務印書館，收入萬有文庫，1930 年初版，1939 年簡編印行）。

1930 年代，《中國教育史》大舉出籠約有一、二十種，堪稱黃金時代。這個時期最有名而且影響後來較大的，當數陳東原的《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其次是周予同的《中國學校制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陳東原氏提出有名的「養士」教育論，周書於 1943 年譯成日文（書名為：《學制を中心とせる支那教育史》），在日本東京開成館發行。此外，如：毛邦偉編《中國教育史》（北平市：文化學社，1932 年）、任時先著《中國教育思想史》全二冊（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再版。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臺一版）、任時先著《中國教育思想史》全二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年臺一版）、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1934年，華世出版社，1977年）等，盛書正文雖短，但準確把握了歷代書院制度發展的要點，對日後的書院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抗戰期間的1940年代，《中國教育史》著作，乏善可陳，除王鳳喈編著《中國教育史》，在1945年，由上海市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發行滬一版外；尚有周思真著《中國教育及教育思想史講話》（上海：世界書局，1943年）。

戰後臺灣的中國教育史研究，就1950年代而言，如前所述，王鳳喈編著《中國教育史》一書，於1951年，仍由正中書局印行臺一版，當是光復後最早發行的中國教育史著作，只是此書為大陸時代的翻刻而已。1954年，由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發行臺三版（修訂本）。在臺出版有關中國教育史著作，較早的成果，當數田培林為師範學校所撰寫的《教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3年）。此書到1976年，已經發行至三十版，足見對師範教育影響甚大。該書係依據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四月公布之「師範學校課程標準」編著，其以「教育史」為名，內容即涵蓋中國與西洋教育史；在結論處，對中西教育制度、思想進行比較。這種編排方式，其實與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之師範教育類似。田氏書言簡意賅，以為中國教育制度的發展，是上而下；西洋教育制度的發展，則自下而上；中國教育思想一貫是注重人的本質和人的關係，直到近代才又注意到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價值；西洋的教育思想，是把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技能當作核心，到現代才注意到人的問題。這是令人深省的歷史發展課題。五〇年代，又有李宗侗等編《中國歷代大學史》（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8年），本書為論文集，集合多人撰述我國歷代大學的發展，此書中並未對於「大學」作一定義，所以體例不盡一致，但大致敘述了我國歷朝官學的發展。

此一時期論文，有黃振球〈中國固有大學教育之演進〉（《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59年）、陳道生〈中國書院教育新論〉（《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第1期，1958年）等。

1960年代，在臺撰成專著者，當以余書麟《中國教育史》（臺北市：師大出版組出版，撰者發行，1960年，1970-71年三版）為最早。洋洋三巨冊，從史前時代的生活教育，論述到中華民國教育。著作注重「生活即教育」，由人類文化史觀出發，闡明教育理論和教育實際變遷，以及教育家的活動。此書本是作者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系講授中國教育史的講稿，內容龐大，但嫌無系統，予人有倉促付梓之感。惟在1950-1960年代，局勢艱困的情況下，能有此作品，堪謂難能可貴。此外，尚有陳伯尹撰《中國教育史》（臺北市：師大教務處出版組，1969年），此書是作為講義（未見），似無出版。

此一時期論文有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與學術的關係〉（《教育與文化》，第259期，1961年），劉季洪〈我國歷代道德教育述要〉（《教育與文化》，第269期，1961年）、安榮祿〈我國歷代學制的研究〉（《臺南師專季刊》，第1期，1968年）、陳道生〈書院制度之源流〉（《思與言》，第1卷第4期，1963年）等。

1970年代，有胡美琦《中國教育史》（三民書局，1978年）。胡氏は錢穆先生夫人，其論述不免深受錢先生影響。錢先生在1967年曾於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連續演講「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其後整理發表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3卷第4、5期，1970年）。胡氏《中國教育史》在錢文影響下，較值得注目的地方，是對中國教育史發展之分期，將秦及兩漢界定為國家教育時期，魏晉至隋唐為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時期，宋元明為書院講學時期。錢文基本論點，在強調歷代政府都能注意公立教育，但在教育史上真實具有影響力者，多在社會私家講學。其次，在中國史上凡屬一大思想家，必然同時成為教育的大師。所以後人讀其書，必該師其人，教育所重視者為全人教育。胡氏進一步強調中國傳統教育看重師資人選遠勝過於學校之場地。縱使無學校，不得視為無教育。故在中國教育史上，乃不能有經歷五六百年長時期之教育場所，如英國牛津劍橋之類，然不能因此而誤會中國人之重視教育乃在英國人之下。錢、胡先生的人師教育論，的確點出傳統教育的特質，值得重視。胡氏《中國教育史》，可說是光復以來較具有獨特見解的著作，直至今日，仍具有指標作用。

在 1970 年代，另一值得注目的著作，是楊亮功《中西教育思想之演進與交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初版）。此書除附錄外，是由十一篇文章構成，看似論文集，其實亦前後連貫，自成體系，誠如書名所示，但分量不算多。本書主旨在說明中西教育史的發展，有其雷同的途徑，此即展現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演變。中西教育史亦皆經歷兩大階段，在西洋是以十二世紀大學興起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為古代，此後為近代；在中國則以清同治元年（1862）為界限，在此之前為傳統舊式教育，此後為接受西洋文化的新教育時期。楊書所收諸文雖不長，但能夠中西並論，也是光復以來較值得重視的著作。此外，楊亮功等編有《中國教育史研究》（漢苑出版社，1977 年初版，1985 年再版），亦是包含多位作者的論文集，共收九篇：楊亮功〈國父教育思想與中庸之道〉、劉真〈中國教育思想的演進及其要義〉、吳鼎〈中國倫理之演變及其精神〉、陳粵人〈西周教育管窺〉、楊承彬〈漢代教育制度研究〉、楊承彬〈魏晉教育研究〉、程運〈兩宋學校制度分析〉、程運〈兩宋學術風氣之分析〉、吳昱昶〈張載教育思想之研究〉等。此一論文集，元以後之教育並無論及，是其缺點。

1980 年代，專書方面，有伍振鷺《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三民書局，1982 年初版，1992 年三版）。伍書是國立教育資料館計畫編寫一套中國的國民教育、中等教育、大學教育等發展史的大學教育部分。其內容涵蓋上古到民國時期，除大學教育及其政教措施外，兼及兩漢的選舉、魏晉的九品中正、以及隋唐以後的科舉等，敘述簡要。伍氏於 1995 年自師大教育系退休後，又將前論有關教育部分選取十篇，編成《中國教育史論叢》（師大書苑，1996 年初版），此十篇著重在近現代教育發展的探討，以及若干教育家（如孔子、墨子、朱子、陸九淵等）教育思想的陳述。

另外，尚有伍振鷺《中國教育思想史》（二分冊，師大書苑，1987 年），但尚未為完卷，目前僅出版兩分冊，即先秦部分與兩宋部分，其書以思想家為敘述單位，分述各思想家之思想脈絡，所以詳於各家之思想，略於思想界演變的大勢，亦可資參考。李建興《中國社會教育發展史》（國立教育資料館，1986 年），此書所論述的社會教育，自周代至現代臺灣，在社會教育史方面的探討，有其特色。

論文方面，有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東師專學報》，第

11 期，1983 年），對我國歷代通行的啟蒙教材進行分析，凡可考者均說明作者、大致內容、流傳時間等資訊，對於以童蒙教材為研究題材的研究者而言，具有相當助益。另外，曹振邦〈古代佛教對小沙彌所施行的儒學教育〉（《大陸雜誌》，第 69 卷第 6 期，1984 年），考述沙彌之初學教材仍為儒家經典，俟有一定程度後再進行佛學教育。

1990 年代，除前述伍振鷺《中國教育史論叢》外，前述林文寶論文於此時出版成書，出版《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東師院語教系，1995 年）。為因應民國八十三年公布「師資培育法」之課程規定，乃由伍振鷺主編《師範教育叢書》，於臺北五南書局出版。其中有徐宗林、周愚文合著《教育史》一書（1997）。此書是繼 1950-1970 年代廣受師範教育歡迎的田培林《教育史》之後的著作，分為上篇：〈中國教育史〉，下篇〈西洋教育史〉。全書內容近五百頁，遠較田書詳盡，並能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是其優點所在。上篇顯然由周氏撰寫，共分十二章，由上古敘述至晚清，著重於選舉（科舉）與學校教育方面。其結論提出若干值得吾人深省的課題，諸如當教育重心過度依賴學校教育的正規教育時，原有家庭、家族、鄉里的非正規教育功能卻日漸萎縮，此點未必有利於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又說當今新式的學校教育，逐漸只重教書，不見教人時，是否應恢復書院式的教育，值得吾人考慮。總結說：「當吾人在改革目前教育、規劃未來發展時，仍須時時不忘以古為鑑。畢竟，古未必不如今，今未必優於古。」這個結論，也是本文在檢討東亞傳統教育後，所要提出的呼籲。

再者，高明士最近出版《中國教育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年初版）一書，是將作者二、三十年來對中國教育史研究作一總合的說明。在方法上，除親自考察臺灣、韓國、日本以及大陸等地學校史蹟（含孔廟、書院等）以外，再由地方志所呈現的平面圖為據，進一步考察傳統學校建構的特質，結論是「廟學制」。作者初步具體提出「廟學制」，作為傳統中國乃至東亞諸國教育機構的基本建構，是在 1983 年，翌年作者乃有《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 年）一書刊行。此次出版《中國教育制度史論》，是進一步由實地考察及方志等文獻予以強化此一論點。以「廟學制」作為傳統中國乃至東亞諸國教育機構的基本建構，是作者首先提出者，自清末民初以來有關中國教育史論

著，都忽略學校（含書院）園地中的祭祀空間（廟、祠）及其教育作用，因而未能凸顯傳統東方教育的特質。這個缺陷所以會長期存在，可能是由於學者（尤其是教育學者）以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觀念來治傳統教育制度；在史料方面，則太過於倚重史書的〈選舉志〉。透過此書的探討，可知史書之〈禮志〉與歷代地方志亦是研究教育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傳統的教育園地，基本上是由教學與祭祀兩個空間構成；其作用，在於強調教育是經師重於人師，教育政策雖為專制王權掌控，但是在專制政治領域之內（或曰治統），仍有一獨特的教育園地空間與理想境界，也等於提示士人積極爭取教育與學術（或曰道統）的自主性並不間斷。秦漢以後的教育，雖流為政治的附庸，但至少不能全由負面去思考傳統教育的發展。所謂歷史的使命，本是延續不斷，今日吾人推行教育改革，更應該以古鑑今。

進入 2000 年代，周愚文新作：《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 年）。此書係採取專題式撰寫，依序包括官學、人才選拔、教育行政、思想統一與控制、私學、書院教育、家庭·家族·宗族與教育、啟蒙教育、婦女教育、主要特色與問題討論等。專題論述成為本書的特點，但專題式較不易克服有系統性敘述之要件。惟本書仍對過去較忽略之家庭教育、婦女教育，乃至啟蒙教育等私學方面問題，作專篇論述，是其優點所在。

三、日本教育史

日本對「日本教育史」的編撰，與明治維新的新制教育的建制有莫大關聯。明治初年以來，有所謂文明開化，致力於汲取西洋文明，翻譯西洋著作成為重要工作。明治四年（1871）七月建置文部省，五年五月仿美國學制於東京設立師範學校，以後陸續增設。由於教育史是師範學校課程之一，所以此後才出現教育史著作。首部教育史著作，是明治十年（1877），由文部省出版的《日本教育史略》，是以學校為中心，全書分三部分：教育概言（由文部省雇員學監美國籍的大關慕來執筆，小林儀秀譯）、教育志略（大槻修二執筆，那珂通高訂正）、文藝概略（榊原芳野執筆）。其有關教育史敘述，即在教育志略，包括文字書籍的起源、諸學

術的傳來、始建學校並附述天文醫藥諸校、始定學令、大學的衰廢、金澤文庫、足利學校、弘文院、諸藩學校以及私塾、定訂學區學制等，已經將日本教育事業大部網羅。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對全國二十六所師範學校的調查，有關日本教育史教材，除自編以外，其教科書仍只採用大槻修二所編的《（日本）教育志略》一種，足見此書在當時的重要性，同時也可看出新編教材有待開發。稍後，文部省以資料欠缺，而對全國作有計劃蒐集。明治二十三年（1890），文部省完成《日本教育史資料》；明治三十四年（1901），由神宮司廳完成《古事類苑》的《文學部》三冊；明治四十年（1907），又完成《群書類從》第十冊《教育部》，提供大量的教育史文獻，為學界造益不少。

明治二十三、四年間（1890-1891），由文部省發行該省總務局圖書課課員佐藤誠實編纂的《日本教育史》上、下兩卷。本書是從廣義的文化史角度，而以考證史學方法寫成，所以不只作為教科書，同時也是大量採用教育史資料的著作。從明治二十六年（1893）以後簇出的內外教育教科書編撰，沒有參照本書者實在極少。這是由於當時的學風，深受德國蘭克（L.V. Ranke, 1795-1886）實證史學的影響，尤其東京大學在明治十九年（1886）成立史學科，明治二十二年（1889）留歐回國的坪井九馬三提倡新的古文書研究，而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創刊的《史學雜誌》，也連載考證的政治史相關論文，一時實證史學甚為風行。佐藤可說在西洋史學以及諸專門史學領域發展此背景下，完成此部書。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再作改正增補發行。

此書自神代至明治三十五年（1902）間，分五期敘述。到德川幕府時代為止，是以漢籍為主的教育，明治以後，輸入歐美學術，而使教育達到空前的盛況，此即太古時代，有所謂神道、醫術、文學、農工商等，雖然還不足以做為一個學科，也為教育貢獻了力量。自應神天皇十六年（285）中國文字傳入日本，至持統天皇七年（693）間的四百多年，日本逐漸開明，文學、醫術、天文曆算倚賴外國人及其子孫始啟其緒，然而未達極盛。至文武天皇，重新依唐制定律令，尤其注重教育，設大學、國學，獎勵學事，遣唐使、留學生與僧人也有傳播學問之功。至嵯峨、淳和天皇時期，教育日趨興盛，此後因國用匱乏，社會動亂，戰事時起，使得

除了武藝以外的學問都不被重視，只剩管弦之類的技藝日益熾盛。後鳥羽天皇到後陽成天皇時期，教育極衰，僧人掌握文教，大亂之世，有長足進步者只有武藝，並開始出現流派。另外如猿樂、茶道也在此時極度流行。

德川幕府時期教育恢復興盛，然學校多半是為武士所設，平民鮮少能進入學校，且身分世襲、階級分明，一般人不易得到拔擢，士人學習學問也不易升到好地位，所以平民願意鑽研學問的人少，女子更不在乎學問。此時雖然崇尚武藝，也少有武藝卓絕之人。此時期已不再有戰亂，明治時代的教育興盛，即奠基於此兩百餘年的泰平上。明治維新後，教育日趨興盛。明治元年（1868）首先以學習院代替大學寮，幕府時代的舊學校再興。二年（1869）將昌平校改稱大學校，尋改稱大學。四年（1871），廢大學，設文部省統轄全國教育事務。此後廣設學校，訂定統一教科書，修正不當內容，學科仿歐美之制，量度國人進步，每加改良，廢世襲陋習登用人材，以政治力整頓教育，使教育方法比過去更為進步，是日本開國以來空前盛況。

明治二十五年（1892）七月，文部省令第八號規定尋常師範學校的教育史學科，應教授內外國教育的沿革以及著名的教育家傳記。這是對教育史撰述內容的重大突破，即以世界史角度來處理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只列為其中一部分。此令頒布不久，即有若干教科書出版，如翌年（1893）的能勢榮《內外教育史》（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高島平三郎《內國教育史要》（東京：普及舍）；再次年（1894），有大東重善《本邦的教育史》（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等。此後的明治後期（1891-1911），有關內外教育史著作紛紛出籠，但多屬於教科書性質，其為學術性質甚少，可說是教育史研究的高潮，據統計，有多達三十多種日本教育史出版。

茲以能勢榮《內外教育史》（1893）為例，其第一篇包含日本、支那（中國）教育史，第二篇包含西洋教育史、西洋教育改良家，最後論及明治維新期的國民教育盛況。本書主要內容在介紹明治26年（1893）以前日本、中國、西洋的學校教育。中國部分，講解先秦諸子的傳授學問、唐代的官學、宋明的私人講學。日本在漢字傳入以前僅有口頭教育，漢字與律令制傳入後，仿中國律令制進行官方教育，至鎌倉室町時代至戰國時代，

學問教育衰微，僅靠僧侶在寺院中教授學問，成為日後的「寺子屋」，能存在學校形式者僅剩「足利學校」與「金澤文庫」。至德川時代，為以道德維繫社會，儒學興盛，學問教育復興，如藤原惺窩、貝原益軒般之著名學者、教育家輩出。幕府與諸藩紛紛設學校、漢學塾、寺子屋，其中昌平學校即是隸屬幕府之學校。西洋的教育，從希臘城邦時期注重德、智、體、美育轉變為羅馬時期的注重實用性與在社會上的價值。至中古時期，只剩教會有能力教育少數人，回教則在東方設立大學研究學術。文藝復興時期重拾希羅精神，卻無法普及教育，至近世才靠大思想家改革教育。書中簡介蒙田（Montaigne）、康米紐斯（Comenius）、洛克（Locke）、盧梭（Rousseau）、裴斯塔洛齊（Pestalozzi）、福祿貝爾（Froebel）、史賓塞（Spencer）、赫爾巴特（Herbart）等人的教育理論。至十九世紀後，西洋各國始有普及教育。明治維新的教育，在明治元年至三年（1868-1870）間，僅以昌平校轉型為大學，取代幕府時代舊制學校。明治四年（1871），廢除舊制學校，設文部省，派員赴歐美考查學制，設官統轄全國教育事務。明治五年（1872）八月，以美國教育制度為基礎，頒布學制，劃訂學區，普及小學教育。自明治十二年至明治二十四年（1879-1891），屢修正教育法規。特別是明治十九年（1886），發布學校令，各級學校於此時整備。其中小學校令又於明治二十三、二十四年（1890、1891）修正，使學齡兒童入學人數過半，普通教育普及全國。維新後，因裴斯塔洛齊、福祿貝爾、盧梭等名家提出之教育理論及基礎教科書均賴美國學者推介、撰述，故明治初年之學風偏向美國，至明治二十年代，逐漸開始仿倣德國。這是第一本依據教育學而完成的著作，即著重於教育史、教育理論與實際的關係、教育家的教育精神。

再者，如文部省編（由白石正邦執筆）《日本教育史》（東京：弘道館，1910年），是對明治以前的教育沿革作有系統而且通俗性的敘述，分為太古期、上古期、中古期、近世期等四期說明。

明治至大正年間的日本教育史研究，主要是歷史學家，例如前述佐藤誠實，此外如三宅米吉、橫山達三、白石正邦、松井簡治等。到大正末期，才有教育學專家的投入，如吉田熊次、高橋俊乘、乙竹岩造、春山作樹、石川謙等。其代表，如吉田熊次《本邦教育史概說》（東京：目黑書

店，1922年）、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東京：教育研究會，1923年）。吉田熊次受教於東京大學三上參次的「日本教育史」講義，與其同期尚有春山作樹及其後的入澤宗壽、海後宗臣等。另一方面，高橋俊乘在京都大學谷本富、小西重直的影響下，自昭和三年（1928）起，在京都大學擔任「日本教育史」教席。吉田熊次《本邦教育史概說》，與其《西洋教育史概說》（1919）是姊妹篇，捨棄佐藤誠實的文化史觀，藉著西洋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而著重於學校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關係，並側重於明治、大正的敘述。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與吉田氏著重於近代學校有別，而從文化史角度，陳述明治以前的教育。其實高橋氏在大正七年（1918），即有《國民日本歷史》出版，在當時歷史學界的影響下，具有豐富的國史教養，古典的訓練。《日本教育史》主要說明日本的教育史並非西方普遍施行的教育史，而是日本過去有其作為教育基礎的意志與精神，因此說明內在的教育學說變遷與外在學校制度的沿革。此書至1929年出版增訂改版本，增補明治維新以後教育史。高橋氏在昭和八年（1933）又出版《日本教育文化史》（東京：同文書院），顧名思義，是由文化史立場著墨，在日本教育通史中獲最高的評價。高橋氏將教育定義為：「從模範到模倣的推移，或者是模範與模倣的關係」，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看法。

大正到昭和之際，在民主主義運動影響下，著重庶民大眾的教育。此期有相當多的日本教育史家出現。首先是春山作樹從寬廣的社會教育立場，將教育史廣義定為教化史，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在廣島高等師範學校講授西洋教育史、東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大正十四年（1925）起在東京大學講授本邦教育史，雖無專著出版，但影響後進如海後宗臣、伏見猛彌等教育史學者，具有開拓者的功勞。此外，庶民教育史的開拓者，有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全三卷（1929）、同氏《日本國民教育史》（1940）。此外，有以教育先哲為中心的教育史，教育思想史研究，以及實證教育史觀的教育史等。整個說來，大正八年（1919）起進入考證的研究，昭和元年（1926）以後有所謂文化史的研究，昭和六年（1931）以後，傾向教育精神史的研究，其後則為一元融合的生成發展史觀等。

就大正到昭和的1920到1930年代而言，堪謂為教育史研究的黃金時

段，尤其是 1930 年代，這個情況，也與中國學界類似。其代表作，如海後宗臣、伏見猛彌、渡邊誠、平塚益德合撰《日本教育史》（東京：目黑書店，1933 年），分上古、中古、中世、近世、最近世諸篇，由教育形態、理想、設施、內容、方法等，以類型史的方法作說明。另外，文部省社會教育研究所編《日本教育の發展》（文部省，1936 年），敘述從上代到明治時期的教育家事蹟及其學說。蓋從昭和六年（1931）以後，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主導政局，此時的教育，強調皇國史觀，強調忠君愛國思想，教育史方面，乃重視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教育精神。此一時期，據統計，至少有二十種日本教育史相關著作出版。

戰後，教育史研究與歷史學研究一樣有其突破性的發展。此即對國家權力的特質與日本近代化問題，乃至於社會群體生活等的關懷。教育方面，重視人文的教育思想，以及基於教育實踐的發展史觀。除戰前以來諸課題外，此時更重視由教育政策、社會教育，或者教育社會學入手，而重視生活教育史，乃至於擴大視野，而強調由世界史立場來看教育史，從中探討日本教育史的特殊性。例如多賀秋五郎《教育史概說》（東京：中大出版社，1952 年），即指出教育的目的，在於從奉獻於政治、宗教解放，而形成人間生活；方法上，在究明從模倣與強制中而邁向獨創與自我活動的過程；同時檢討歐、美與中國教育史對日本的影響，以瞭解日本教育發展的特質。所以此書前半部概要介紹自大化革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學校教育，後半部介紹明治維新以前影響日本教育的中國教育史，以及明治維新後的歐美各國教育史，並擇要介紹十八、十九世紀著名教育家的生平與著名理論。

唐澤富太郎《日本教育史》（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53 年第一版，1956 年增補版），同氏《日本教育史：近代以前》（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68 年第一版）。作者認為自己無法在這本通史性質的書中簡略交代「近代日本教育史」如此龐大的內容，所以 1968 版完全刪除 1953 版中介紹近代教育部分。作者全書是試圖將教育史作為考察「人間像」的展開，也就是所謂「歷史的人間學的解釋」，在各時代如何來描述理想的人間像，如何透過教育的努力，來實現理想的人間像。

將日本教育史納入世界史來考察，其代表作，如梅根悟《世界教育

史》（東京：光文社，1955年；新評論株式會社，1967年改訂版），此書重視世界教育史的民眾教育與兒童的幸福。除日本以外，亦論及中國、韓國的傳統教育。其次，到1970年代，較值得注目的成果，是梅根悟監修而由世界教育史研究會編的《世界教育史大系》（東京：講談社，1974-1978年），共四十卷，由一百數十位學者共同執筆，其中《日本教育史》全三卷（1975-1976）。此大系之作，誠如監修者梅根悟所說，是因日本的教育，長時間以歐美先進國家的近代國民教育發展軌跡作為模範而改進，但若考察所謂開發中國家，或者第一次大戰以來世界各地締建新歷史的社會主義諸國的教育，儘管各國教育有多樣化的發展，但是仍有其推動世界史的教育動向。在這個前提下，日本的教育，似應當一方面重建民族的傳統，另一方面再創造與世界相通的教育。依據這個問題意識，而企劃編集此套書。此套書的《日本教育史》，共有三卷，是全套書中份量最多者。其第一卷，主要敘述古代到近世，也就是明治前期的通史；第二卷，主要敘述明治後期，強化國家主義教育，大正時期民主主義運動之下的教育自由與反動，天皇制教育思想以及臺灣教育等；第三卷，主要敘述昭和時期戰前、戰後的教育政策，琉球教育史等。至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教育，則於另卷《朝鮮教育史》說明。

1980年以後迄今，雖有若干著作出版，但對前賢少有突破，如：名倉英三郎編著《日本教育史》（東京：八千代出版株式會社，1984年初版）、「講座日本教育史」編集委員會編《講座日本教育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84年）、堀松武一編《日本教育史》（東京：國土社，1985年）、石川松太郎等著《日本教育史》（日本町田：玉川大學出版部，1987年）、竹內明編《日本教育史》（京都：佛教大學通信教育部，1989年）、土屋忠雄、吉田昇、齋藤正二編著《日本教育史》（東京：學文社，1993年）、鈴木博雄編著《日本教育史研究》（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93年）、土屋忠雄等《日本教育史》（東京：學文社，1993年）等。

其中名倉英三郎編著《日本教育史》（1984），分六章，第一章〈古代的教育〉、第二章〈中世的教育〉、第三章〈近世的教育〉、第四章〈明治期的教育〉、第五章〈大正・昭和前期の教育〉、第六章〈現代的

教育〉，可說是傳統的記述體，時代完整。本書其實是作為大學、短大教科書，在近現代部分加入社會科學、教育學等觀點，及各種統計資料探討，希望能引起讀者對日本教育史的興趣與關心，進而應用在教育實踐上。其論述，較值得注意者，為近世教育與中世相比較。作者指出近世教育的特色，為：（一）依身分設置的各種學校發達，（二）社會教化運動勃興，（三）教育及教化思想興盛；此三者相互關聯，教育逐漸在各方面滲透進日本人生活。和平是教育發達的基礎，為求維持和平、政權安泰，幕府獎勵儒學，設置各級學校，使武士教育延續中古以來文武兼備的理想。庶民教育的發達也是近世教育中最值得注目的一點。由於庶民生活水準提升，在庶民與為政者雙方要求下，庶民受教者、教育設施與教材皆增加。教育思想方面也有長足發展。明治新政府以近代化為目標，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為當務之急，故政府主導的教育也朝此方向改革。大正、昭和前期的教育，著重國家思想、國民精神，確立社會教育體制，壓制思想，二次大戰中動員學生，使教育崩壞。戰後教育的最初課題為徹底排除軍國主義，昭和 22 年（1947）發布教育基本法與學校教育法，具體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改變學制，補助教育經費，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擴充就學前教育，改善高等教育，將大學大眾化，確立新教員養成制、制定「教育制員免許法」，注重障礙兒教育，振興社會教育。

石川松太郎等著《日本教育史》（1987），係屬合著，依時代順序，共分五章，第一章為〈古代的社會教育〉（壽福隆人），第二章為〈中世社會的教育〉（大戶安弘），第三章為〈近世社會的教育〉（關山邦宏、多田建次），第四章為〈明治的教育〉（石川松太郎、多田建次），第五章為〈大正期、昭和前期的教育〉（多田建次）；另外，附錄石川松太郎撰〈日本的日本教育史學的發達〉、天野晴子〈日本教育史略年表〉二文。此書是做為大學的教科書，不只提供日後將成為教師的學生及現職教師研讀，也希望提供關心教育者閱讀。此書的中心意識在於說明「人是什麼？」、「人成為真正的人之前，教育發揮何種作用？」、「要使每個日本民眾獲得幸福，並且可以永續發展和平社會，那麼教育應當是何種形式？」透過這樣的課題，來瞭解日本教育史。

土屋忠雄等《日本教育史》（1993），係土屋忠雄、吉田昇、齋正二

等多人合寫編著。全書除序章〈教育史研究的意義與方法〉外，從古代到現代共分十二章。其序章，首先論及為何要研究教育史？其意義何在？結論是為了讓今日及明日的教育有更好的發展，為了將來而研究過去。教育史研究因為是教育學的一個分野，所以從事教育研究，必然會產生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會使用到實證、量化等作業，但希望由「主體的統一」來認識客觀的事相。序章並對明治以來的教育史研究，作了簡要的研究史說明。對初學者而言，提供良好的指引。至於十二章的內容如下：從日本列島的黎明到古代國家的成立、古代律令國家的教育文化、中世社會的教育、近世封建社會的教育、町人階級的抬頭及其教育、近代教育意識的萌芽、近代國家的教育、大正民主與教育、昭和初年的教育、戰時下的教育、戰後的教育、現代的教育等。這些內容，可說自古至今作了周到的陳述，實是最近較值得矚目的作品。

四、韓國教育史

有關韓國教育史的著述，因為國情關係，較為特殊，可分兩方面，一為日本學者著作，一為韓國學者的著作。在戰前的著作，都是出自日本學者，例如高橋亨述《朝鮮の教育制度略史》（1920）、小田省吾《朝鮮教育制度史》（收入《朝鮮史講座》分類史，1924）等。戰後有關韓國教育史的著述，又可分三方面，一為南韓，一為北韓，一為日本學者的著述。南韓學者的著述，以李萬珪《朝鮮教育史》上、下兩卷（漢城：乙酉文化社，上卷 1947 年，下卷 1949 年）為最早，其次有朴相萬《韓國教育史》全三卷（大韓教育聯合會，上卷 1956 年，中卷 1957 年，下卷 1959 年）、現代教育叢書《教育史》第二編（後編）《韓國教育史》（漢城：現代教育叢書出版社，1961 年）、韓基彥《韓國教育史》（漢城：博英社，1963 年；同書，韓基彥與井上義巳共譯，日本柏市：廣池學園出版部出版，1965 年）、車錫基·申千湜《韓國教育史研究》（漢城：載東文化社，1969 年）、韓國教育史研究編《韓國教育史》（漢城：教育出版社，1972 年）。北韓學者著述，有宋枝學譯編《朝鮮教育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 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教育圖書出版社發行《朝鮮教育

史》（東京：學友書房翻刻，1963年）。日本學者撰述者，為梅根悟監修之《世界教育史大系5·朝鮮教育史》（東京：講談社，1975年）。

茲以李萬珪《朝鮮教育史》為例作說明。全書上、下卷共分九編，第一編〈緒論〉、第二編〈原始時代的教育〉、第三編〈扶餘與韓時代的教育〉、第四編〈三國時代的教育〉、第五編〈南北朝（新羅與渤海）時代的教育〉、第六編〈高麗朝時代的教育〉、第七編〈李朝時代的教育（到高宗甲申年前）〉（以上為上卷）、第八編〈李朝終前二十七年間教育、李朝終後三十六年間教育〉（以上為下卷）。此處格外值得注意者為第五編，分成南北朝時代的教育，此處的南北朝，指新羅與渤海，因為渤海為高句麗亡國後，由其遺民大祚榮所建。李氏所以有《朝鮮教育史》之作，是鑑於日本、中國以及西洋早已有教育史專著，則該國自亦有教育史著述之必要。其書強調教育史是研究人文的進步以及思想的變遷，進而探討教育事業，以及教育學說的進步發展情況。

韓基彥《韓國教育史》，則以「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教育史。此書首論韓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在於固有要素以外，並含有外來的要素。外來的要素，包括滿蒙系統、中國系統、南方系統、印度西域系統、北方系統以及西域系統等。在中外文化系統於韓國民族的性格、韓國半島的風土條件中相互融合，而開創出韓國文化，例如韓國文字的諺文，即是世界上稀有文字。此書共分五章，第一章〈古代社會與教育〉，第二章〈高麗社會與教育〉，第三章〈朝鮮社會與教育〉，第四章〈近代社會與教育〉，第五章〈現代社會與教育〉。其內容，摘要如下：原始教育明顯的特質是非進步性與模倣性。原始教育中，成年禮是極具教育意義的儀式。原始韓族有著戰士團般的青年集團，以「鑿背皮，以大繩貫之，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為痛」做為成人訓練的標準。韓國在建國前的扶餘時代即使用文字，學校教育始見於《三國史記》，記載高句麗的小獸林王二年（372）「立太學教育子弟」，做為教育貴族子弟與養成官吏機關。相對於官學，最早的私學「扁堂」在五世紀後出現，類似西洋中古的教會學校，教習中國經典，課程從初級至大學程度皆有。高句麗、新羅、百濟又各自派留學生赴中國入國學，由此推測，新羅、百濟可能也有類似國學的教育機關。另新羅的「花郎道」則是自然發生的民間青年運動，相互砥礪

道義、共同遊山玩水行樂，再從中選拔優秀人物推薦給朝廷。新羅完成三國統一後，設國學，教學內容主要分儒學科與技術科，教導儒家的忠孝禮儀，並獎勵學問，以「讀書三品」做為人材登用標準，成為後來「科舉法」的前身。隨佛教影響力遍及朝鮮半島，民間亦受教化。

高麗社會構造與文化上繼承新羅社會，本質未變。第四代光宗實施科舉制，第六代成宗在位時期（982-997）設國子監與勸學官制度，仁宗五年（1121）設地方學校性質的鄉校。儒教是教育的中心思想，民間思想以佛教佔優勢，花郎派則屬高麗朝中期為止民間傳承的國風思想，強調獨立、自主、進取。高麗朝中期後，政治上重文輕武，使得過去興盛的文教衰微，變得有名無實。儒學學風於高麗朝末期開始轉向注重格物致知的理學。

朝鮮前期，最重要的是世宗於 1443 年訂定訓民正音，其中母音十一字，子音十七字，用以取代難學的漢字，此後便逐漸翻譯各種典籍為韓文，也開始有了韓文文學的創作，如作者不明的《春香傳》。燕山君時期，曾經一度禁止新文字的使用，中宗時期又恢復。十七世紀，透過清朝傳入西方文明，使得實學思想開始抬頭。朝鮮時期，教育形態分為隸屬政府的官學如成均館、五部（四部）學堂、鄉校，政府登用人才的科舉制度，以及隸屬私學的書院、書堂。朝鮮社會初期的思想主流是儒學，駕凌在高麗末期日趨頹廢的佛教思想。中期思想主流以性理學，亦即理學、宋學為思想中心。此時也是朝鮮社會教育的成熟期，教育家哲學思想發達，理念多端，教育方法進步。進入後期，批判性理學的實學思想抬頭。受清學與經中國傳入的西學影響，學風變成實事求是，學者傾力考證各方面的實用學與經典。此外，因天主教傳至中國與日本，西歐書籍與天主教宣教書籍由使者帶回，天主學逐漸成為學者有興趣的學問，並且以年輕有才氣的學者為中心，向民眾傳布。

1880 年代後至 1945 年約七十年間，朝鮮放棄鎖國政策，列強勢力與新文化進入，於 1885 年，由基督教傳教士正式在朝鮮設立近代學校如培材學堂、倣新學校、梨花學堂、貞信學校等，約為中學程度，目的是養成基督徒與國家人才，新舊學問、近代科學、聖經與體育都包含在課程內容中，要求學生品行，基督教也同時在此時扎根發揮影響力。梨花學堂則為

韓國近代女子教育濫觴。甲午更張後，開始有了教日語、英語、中國語的外國語學校及各種專科學校，結束了過去學校以養成官吏為唯一目的。1910年日韓合併，1911年發布「朝鮮教育令」，規定學制，企圖將韓國人變成忠良的日本人。高宗企圖排除日本的政治干預，失敗以終，經過1919年的三·一運動，日本總督齊藤實於同年八月提出「日鮮融和」、「一視同仁」的「文治文化政策」，1922發布「改正教育令」，修正部分學制，使韓人有機會進入大學與師範學校。至1938年日本發布「教育令改正」，對韓國人進行皇國臣民化，至1945韓國人才擺脫日本帝國的枷鎖。此時期中，教育逐漸普及，民族主義思想抬頭，但被日人所壓抑。此時的教育家同時也是民族主義思想家與行動指導者。

1945年民族解放，1948年大韓民國成立，將各級公私立學校改制，實施教育自治制，提倡自主獨立、尊重個體思想，強調道德教育，設置鄉土學校，也研究西方學術，京城帝國大學成為研究東西洋學術的中心，也研究本土的「韓國學」，開始在各種學術上發揮韓國文化特色。

梅根悟監修《世界教育史大系 5·朝鮮教育史》，是日本在1970年代規劃出版教育史四十卷的大貢獻之一，也是戰後首部由日本學者撰成的朝鮮教育史。此書分兩大部分，一是通史，由渡部學負責撰寫，一是專題，有五個，分別由阿部洋、馬越徹、菅井鳳展、廣川淑子、欄木壽男等五位學者專家執筆。渡部氏所撰的通史，由古代朝鮮的教育說起，到1945年日本的殖民統治為止，希望克服朝鮮歷史的近世與近代的「斷絕」觀，而以近世至近代具有通貫性的朝鮮教育史來掌握。全書在緒論之外，分為五章，第一章〈扁堂與花郎：古代朝鮮的教育〉，第二章〈國學的成立與讀書三品制：三國的教育〉，第三章〈國子監的隆盛與私學的發達：高麗的教育〉，第四章〈國學的整備與國民教育的發達：李朝前期的教育〉，第五章〈李朝教育再編的前進：李朝後期的教育〉，第六章〈朝鮮近代教育為何？：作為「換骨奪胎」的聯續而前進〉。其五個專題，分別是：（一）韓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問題（馬越徹），（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教育，（三）朝鮮的教會學校：以創業時期的教育活動為中心，（四）日本教育界的朝鮮教育論：以日韓合併時期的教育雜誌為中心，（五）朝鮮殖民地教育的展開與朝鮮民族的抵抗：以朝鮮教

育令為中心。就通史的最後一章（第六章）而言，主要強調 1864 年後，朝鮮進入近代，至 1945 年為止，首先是大院君李昱應企圖推動復古，仍阻止不了傳統士林文化動搖。1906 年後，進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支配時代」，民族主義抬頭，代表性知識分子如李昇薰設立五山學校，推動民族獨立教育及三·一獨立運動。在外族入侵、民族思想抬頭下，甲午改革（1894）中廢科舉、訂定新學制，也開始有女子學校與特殊技術教育的學校。除了政府主導的改革外，私學勃興，學術上則開始產生近代性，學術主流從朱子學轉為實學思想，再轉為近代開化思想。然而朝鮮民族在民族主義覺醒後，欲追求自主的教育，卻遭遇到日本殖民政府以「換骨奪胎」政策進行皇國臣民化教育。

專題部分，主要在補充通史對 1945 年以後的教育史。其要旨在說明 1945 年後，朝鮮半島分裂為南北韓，南韓在高等教育上學校量與學生數擴大，卻也面臨了質的問題，因而由政府與大學本身進行改革。北韓企圖以「千里馬計畫」進行集團技術革新，以社會主義教育學原理進行九年制技術義務教育，但其教育理念內部卻存在矛盾，又無餘裕進行檢討，難以看出成果。

另外，由吳富尹翻譯高明士所著有關韓國教育史諸論文，彙集成專書：《韓國教育史研究》（漢城：大明出版社，1995 年）。此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古代的學校教育〉，第二章〈隋唐貢舉制度對新羅的影響〉，第三章〈羅、麗時代廟學制的創立與展開〉，第四章〈高麗時代科舉制度的隋唐要素〉，第五章〈朝鮮時代教育機構的祭祀制度的考察〉，第六章〈謁聖禮與謁聖試〉，附錄一〈中國文化與東亞世界〉，附錄二〈韓國的孔廟與孔聖後裔〉。此書主要在說明韓國自新羅時代起，即已完成東亞共同的教育特質：「廟學」的教育制度，其實施科舉制度，是以唐制為藍本。

1980 年以後迄今，韓國學界似無重要成果問世，韓國（朝鮮）教育史的通史著作，有沈寂之勢，這一點與日本學界類似，值得注意。

五、亞細亞教育史

將「亞細亞教育史」當作共同課題來進行團隊研究，是日本多賀秋五郎多年來所提倡，成果亦可觀，值得吾人注意。例如早在 1950 年即已成立「東洋教育史學會」，透過這個學會而向日本文部省申請研究補助，並舉行定期討論會。1977 年，發行《東洋教育史研究》第一集，至 1992 年 3 月，改為《アジア教育史研究》迄今。其研究成果，呈現在多賀秋五郎編著《古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京都：日本學術振興會，1977 年）、同氏編著《中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80 年）、同氏編著《近世東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東京：財團法人學術書出版會，1970 年），以及學會為多賀秋五郎先生祝壽的論文集，有：《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東京：不昧堂出版，1983 年）、《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東京：巖南堂書店，1989 年）等。

只是這些研究成果，雖以亞細亞教育史為共同範圍，實際成果則以中國教育史研究成果居多，其次為日本、印度、韓國、越南、西藏等地。誠如多賀氏在《近世東アジア教育史研究·序》所指出者，主要是以漢字教育圈國家為主，而且不同於前面所述者，多為斷代的論文，有違本文通史體例，所以此處只將些研究論文開列於下，以供參考。

（一）中國方面

《古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古代中國における「厠」の成立と「興」の展開〉（多賀秋五郎）、〈古代中國教育史構成上の諸問題〉（内野熊一郎）、〈古代中國における儒家教育思想の論理構造〉（市川本太郎）。

《中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儒教主義學校體系の形成〉（多賀秋五郎）、〈中國書院における教育法の宗教的底流〉（林友春）、〈唐宋時代の醫學教育〉（吉田寅）、〈中世中國における武學・武科舉〉（笹島恒輔）、〈中國史上の庶民教育と善書運動〉（酒井忠夫）、

〈隋唐・鎌倉の浄土教と民衆教化〉（鈴木健一）、〈元代における庶民文化〉（小林新三）、〈晉代における水旱災と陰陽思想〉（佐久間吉也）。

《近世東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明太宗の學校教育政策〉（多賀秋五郎）、〈明の關節生員と納粟監生〉（曾我部靜雄）、〈中國における書院の推移〉（林友春）、〈清代江浙地方の書院と社會〉（大久保英子）、〈王陽明の教學精神〉（岡田武彦）。

《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漢代の儒學國教化について〉（平井正士）、〈胡服について〉（横山貞裕）、〈前涼時代河西に流入する漢人〉（前田正名）、〈唐の和蕃公主——回紇を中心として〉（築山治三郎）、〈唐代廟學制の實態及びその特質（唐代廟學制的實態及其特質）〉（高明士）、〈宋仁宗時代の磨勘の法について——特に劉太后攝政時代の京朝官を中心として——〉（古垣光一）、〈王安石の學統〉（東一夫）、〈宋朝の祈雨について〉（中村治兵衛）、〈「宗門武庫」と「從容錄」——南宋初期の禪宗教化について——〉（阿部肇一）、〈南宋總領所の任用官——「開禧用兵」前後の四川を中心に——〉（伊原弘）、〈中國に於ける異民族王朝の軍事教育〉（笹島恒輔）、〈明代衛所官の世襲狀況について——「衛所簿」の分析を通して——〉（川越泰博）、〈蘇奴一族の受難〉（矢澤利彦）、〈清代の臨幸と進講について〉（片山兵衛）、〈入華宣教師ファーバーの「大德國學校論略」について〉（吉田寅）、〈清末の川邊經略と川軍の入藏〉（光島督）、〈清末における學堂教育と日本人教習——直隸省の場合——〉（阿部洋）、〈陶行知と山海工學團〉（小林善文）、〈南滿醫學堂について〉（鈴木健一）、〈中國の「四つの現代化」歴史教育〉（西卷一）。

《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魯の祈穀の郊祭について——特に郊祭の時節を中心として——〉（藤田忠）、〈漢代の有用文字について——官吏と識字——〉（池田忠一）、〈董仲舒の政治理念と教育思想に關する一考察〉（鍾清漢）、〈王朝の交代による中國軍事教育の變遷〉（笹島恒輔）、〈晉代の奴婢について

(上) (佐久間吉也)、〈東アジア女子教育史上における中國女訓書の役割——教育の特質・編成技術・他國、とくに日本への傳播について——〉(山崎純一)、〈論中國傳統教育與治統的關係〉(高明士)、〈中國における書院教育研究——周書齡著『書院制度之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林友春)、〈峨嵋山信仰と禪宗〉(阿部肇一)、〈宋代の殿試について——「趙清獻公充御試官日記」の紹介〉(古垣光一)、〈湛甘泉の學說を回って〉(志賀一郎)、〈入華宣教師ネヴィアスの中國語著作について〉(吉田寅)、〈日清貿易商會構想と日清貿易研究所〉(佐佐博雄)、〈中國近代の平民教育運動——特に湖南省を中心して——〉(高山徹)、〈滿州教育專門學校について〉(鈴木健一)。

(二) 日本方面

《中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中世日本の寺院學校と民眾教育の發達〉(結城陸郎)、〈日本中世教育におけるギルド的傾向〉(久木幸男)。

《近世東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天主教傳來とその教育活動〉(海老澤有道)、〈徳川幕府の庶民教化政策——對書籍・出版文化を中心として——〉(山下武)、〈近世社會教育の形態と主張〉(大槻宏樹)。

《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木簡・墨書土器と古代民眾教育〉(久木幸男)、〈飛驒安國寺の元版大藏經について〉(酒井忠夫)、〈足利學校の中世と近世〉(結城陸郎)、〈江戸時代庶民の「家」觀念〉(尾形利雄)、〈近世高山文化の社會的性格〉(芳賀登)、〈宣長の設定した國學入門課程について〉(吉崗榮)、〈新發田藩庶民教育政策成立の思想的背景——八代藩主溝口直養の教育觀を中心として——〉(山下武)、〈薩摩藩の朱子學派について〉(井原政純)、〈近世の語彙科往來「對相四言」の教育史的意義について〉(石川松太郎)、〈明治初期文部官僚の形成過程に關する一考察——中川元を手掛りとして〉(鈴木博雄)、〈明治初期における公立外國語學校〉(神邊靖光)、〈西村茂樹の思想における東洋的なる

ものと西洋的なるもの〉（片山清一）、〈再び哲學館事件について〉（小倉竹治）、〈海外留學と國際結婚〉（加藤正泰）。

《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空海の教育思想〉（吉岡榮）、〈小野篁足利學校創建傳説考〉（久木幸男）、〈東洋文庫所藏謄寫本《宋會要》（蕃夷）について〉（伊原弘）、〈長享の將軍親征と美濃守護土岐氏〉（谷口研語）、〈安樂庵策傳は金森長近の弟〉（關山和夫）、〈加賀藩の町人教化策に關する考察——五代藩主前田綱紀時代を中心として——〉（山下武）、〈白河桑名立教館〉（名倉英三郎）、〈外國人の見た近世日本の初等教育〉（片山兵衛）、〈江戸時代庶民の忠孝道德の一考察——民眾教訓書を中心として——〉（尾形利雄）、〈藩學との關連からみた明治初期・東京の私學開設考〉（神邊靖光）、〈「中學校教則大綱」制度の確定過程に關する一考察——文部省の通牒・指令類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四方一瀨）、〈女子教育論——女子の長所・短所とその教育〉（天野隆雄）、〈女子教育者棚橋絢子の一斷面〉（結城陸郎）、〈昭和初期「學制改革諸案」の女子高等教育制度構想に關する基礎的研究〉（高橋次義）、〈明治初年における課業形態に關する一考察——筑摩縣飛驒地方を中心として——〉（磯邊武雄）、〈北飛驒の僻村・河合村に於ける明治時代の學校教育に就て〉（岡山準）、〈子守學校の研究——子守兒童の募集方法——〉（長田三男）、〈中島德藏と哲學館事件〉（小倉竹治）、〈學制前における東京府内學校設立の一考察〉（井原政純）、〈日本水上學園の歴史〉（小塚三郎）、〈占領下の教育改革——第一次米國對日教育使節團報告書と國語改革〉（土持ゲーリー法一）、〈ボン教學統の研究——12世紀、13世紀の北部古傳學派について〉（光嶋督）。

（三）韓國方面

《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征東行省と高麗〉（栗林宣夫）、〈舊韓末在郷處士の外勢事件對應——壺山朴文鎬の『日史』から——〉（渡邊學）。

(四) 印度方面

《古代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インドにおける古代教育の成立とその形態——〉（藤謙敬）。

《中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中世インドにおける宗教と教育——〉（藤謙敬）。

《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インドにおける國民教育運動（1920-22）の成立、展開に關する考察〉（弘中和彦）、〈近代インド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教育〉（藤謙敬）。

《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インドにおける「仕事經驗教育」の成立とその構造的特質〉（弘中和彦）。

(五) 其他

《中世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チベット於ける佛教學堂の成立と佛教教學の變遷——〉（光嶋督）。

《近世東アジア教育史研究》：收入〈ベトナムの科擧制度と學校——〉（竹田龍兒）。

《多賀秋五郎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初期「東洋教育史」とその概説の意義〉（林友春）、〈教授・學習過程における科學化とシステム化——視聽覺教育時代から教育工學時代への一試論〉（磯邊武雄）。

《多賀秋五郎博士喜壽紀念論文集：アジアの教育と社會》：收入〈カーストと教育の歴史的考察〉（藤謙敬）

六、東亞教育史研究

以東亞為範圍，從事教育史研究，恐以拙著《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年）為最早。所謂東亞，除中國本土以外，並包括朝鮮半島、日本以及越南等地；本文因為探討東亞教育圈的形

成，所以時代限定乃以唐朝時期為主，也就是七、八世紀之際，此時越南在中國本土以內，但朝鮮半島是由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走向統一新羅時期，日本則積極從事律令國家建設。為此之故，隋唐時期的中國文化傳入到此一地區之後，形成所謂「中國文化圈」，或謂「東亞文化圈」，或謂「漢字文化圈」。文化圈的形成，實有賴於當地教育事業的推展，這種教育事業，也就成為文化圈的基礎。本文即探討漢唐間教育事業發展，以及朝鮮三國（含統一新羅時期）、日本的教育事業發展，進而對十世紀獨立以後的越南也有觸及，以便相互印證。於是提出「廟學」是東亞教育事業發展的共通形制；其教育活動，下列諸項是共通的，此即：漢字教育、儒學教育、養士教育、成聖教育。因為有這些共通諸要素，所以自七、八世紀以後的東亞，藉由教育圈的形成，而出現文化圈，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西方強勢文化的入侵，始告解體。

七、結論：東亞教育史研究的新動向

由以上的檢討，可知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教育史研究在歐美學術影響下，成為歷史學、教育學研究之一專門領域。在東亞地區，此一門新學問，先由日本拓展，再由日本影響東亞地區，尤其中國。起初是師範學校講授課程之一，採取內外教育史與國別教育史的編排，後來逐漸將國別與外國教育史分別安排。到 1930 年代，有關教育史著作達到高峰，惟緊接著又進入二戰局面，研究工作幾乎停頓，各領域也都是如此。

日本在大正到昭和之際，因受民主主義運動的影響，所以庶民大眾的教育史，一時有較多出版，但是軍國主義興起後，此一學風受挫。一般說來，到 1950 年為止，東亞教育史研究可說是以學校教育史為中心而展開。因為傳統學校教育為國家施政的一種表現，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由於受到西方壓迫，危機意識強烈，國家主義及軍國主義高昂，所以傳統的國家發展，尤其王權的性質受到較多的關注。這種情形，在 1950 到 1960 年代仍是方興未艾。但自五〇年代以來，由於中共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因此以農民為主的廣大社會群眾生計問題，再度受到注目。就歷史的研究，所謂農民起義、民眾為歷史發展的動力，乃至於賤民層存在等問題，成為研究的

焦點。教育史研究深受歷史學研究趨向的影響，所以在二戰後，教育史研究除持續以學校史為中心以外，同時研究焦點逐漸成為多元化，例如教育文化史、庶民教育史、生活教育史、家庭教育史、婦女教育史等諸多分野的開拓，且有成果展現。但因本文是以通史為主，對於諸專門史省略，所以此處不能窺其堂奧。但由通史的著作中，仍可瞭解一二。例如多賀秋五郎《教育史概說》（1952），即重視生活教育史，並擴大視野，強調由世界史立場來看教育史，從中探討日本教育史的特殊性。胡美琦《中國教育史》（1978），將中國教育史發展，分為秦及兩漢的國家教育時期，魏晉至隋唐的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時期，宋元明的書院講學時期。即由國家教育逐漸演變為民間教育的過程，因而格外強調教育人才的培養，私學盛於官學，這種說法，其實也是錢穆的一貫主張。最近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2001），除論及官學外，並兼及私學、書院教育、家庭·家族·宗族與教育、啟蒙教育、婦女教育等，正是戰後多元化研究以民間教育問題受到較多關懷的最佳說明。

日本方面，例如唐澤富太郎《日本教育史》（1953、1956）、同氏《日本教育史：近代以前》（1968），即試圖將教育史作為考察「人間像」的展開，在各時代如何來描述理想的人間像，如何透過教育的努力來實現理想的人間像。也就是所謂「歷史的人間學的解釋」。石川松太郎等著《日本教育史》（1987），目的在於說明人是什麼？人成為真正的人之前，教育可發揮何種作用？要使每個日本民眾獲得幸福，並且可以永續發展和平社會，那麼教育應當是何種形式？這些課題成為該書撰述的重點。韓國教育史方面的著述較為特殊，可分兩方面，一為日本學者著作，一為韓國學者的著作。在戰前的著作，都是出自日本學者，戰後有關韓國教育史的著述，又可分三方面，一為南韓，一為北韓，一為日本學者的著述。戰後較早的著述，如南韓學者李萬珪《朝鮮教育史》上、下兩卷（上卷1947年、下卷1949年），著重於人文的進步以及思想的變遷，進而探討教育事業，以及教育學說進步的情況。日本學者撰述，如梅根悟監修《世界教育史大系 5·朝鮮教育史》（1975），除敘述傳統的官、私學外，著重於近代教育史，從朱子學論述到實學思想，再進入近代開化思想，朝鮮民族主義覺醒後，追求自主教育是為重點，惟遭受日本殖民政府以「換骨

奪胎」政策進行皇國臣民化教育，而受到壓抑。

戰後另一新發展動向，為將亞洲或東亞當作一整體來考量。以亞洲作為整體來考量的，可以多賀秋五郎為代表；以東亞作為整體來考量的，可以高明士為代表。多賀氏的貢獻，除組成研究團隊並發行相關刊物外，最受矚目的當是他的古稀、喜壽紀念集，均以亞洲教育史為書名，但以文化史為重點。高氏的貢獻，在於提出「廟學」制係東亞的共通教育特徵，而有所謂「東亞教育圈」論的提出，並進而指出「東亞文化圈」（或謂中國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形成，係以共通教育事業（或謂教育圈）為動力而展開。這是將政治、文化與教育發展相合來立論，為戰後教育史發展開拓新的方向。

總之，東亞教育史研究還有待開發的課題仍多，自 1980 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似有萎縮之勢，這種情況，希望早日改善。所幸又有新課題不斷地提出，更希望有繼起者加以發揚光大。